

澳門文化叢書 4

澳門記畧校注

印光任

張汝霖

原著



趙春晨

校注



澳門文化司署

澳門文化叢書 4

澳門記畧校注

印光任

甄敦霖

邱著

經



趙春晨

校注

澳門文化司署

ISBN-972-35-0123-6

Edição •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2)

出版：澳門文化司署（1992）

Direcção Gráfica e Capa • Mio Pang Fei

美術主任：廖鵬飛

Execução Gráfica • Sit Design

封面製作：薛氏設計公司

Fotocomposição • San Ngai Computer Typesetting Co. Ltd, Macau

植字：新藝電腦植字排版有限公司

Montagem e Impressão • Tipografia Welfare

排版和印刷：華輝印刷

Tiragem • 2,000 exemplares

發行數量：二千本

【內容提要】

《澳門記略》完稿於1751年。它是研究澳門歷史舊貌及地理風物的重要文獻資料，也是研究澳門文化的重要著作之一。這個校注本是目前所有《澳門記略》版本之中最完善的一部，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校注者趙春晨教授是研究《澳門記略》的中國專家，他對該書做了詳盡的校勘和標點，並寫了1090條注釋，治學態度嚴謹認真，令人欽佩。

《澳門文化叢書》

編 審 ●
美術主任 ●
編 輯 ●
助 理 ●

中文出版小組

黃曉峯
繆鵬飛
徐 新
周劍明

3

《澳門文化叢書》書目

《雪廬詩稿》 梁披雲 著

本集精選澳門老詩人梁披雲先生舊詩手稿《夢痕心影集》（1928—1949年）、《瀛海嘯歌集》（1950—1966年）和《秋鴻嘴爪集》（1966—1988年）之中的四百餘首佳作影印出版，裝幀設計既講究傳統特色又極具現代藝術氣派，以滿足鑒賞與珍藏者所需。

梁披雲學名龍光，別號雪予，祖籍福建永春。六十年代移居澳門，現任澳門歸僑總會會長、澳門福建同鄉會會長、澳門筆會會長、澳門中華詩詞學會會長、香港書譜出版社社長以及福建泉州黎明大學董事長兼校長。星洲名家潘受評雪廬詩謂：“七絕少迴旋餘地，古人稱難，翁獨挽強命中，略不費力，運魏晉人神理，入唐宋人格律，難上加難之境也，而翁時亦有之。”

《澳門現代藝術和現代詩評論》

黃曉峯 著

此書主要收集著者近年在澳門撰寫的部份有關澳門現代藝術和現代詩兩個方面的評論文章。其中提及的現代主義因素主要是以澳門八十年代之前在文學和藝術視野所呈現的整體之傳統特色作為參照系而言的，而且主要指澳門華人社會，個別的例外必須從澳門以外的地區去追尋蛛絲馬跡。

把澳門的“現代藝術”和“現代詩”扯進同一本書裏並非“純屬巧合”。既然澳門已呈現出一種東西文化交往的強烈意向，毋庸置疑，文化開放與文化交融應成為現代澳門文化的特性。為此，著者對澳門文化體、現代畫會的畫家和澳門五月詩社的詩人作了多種視角不同層面的評論。

《殊途同歸》 潘日明神父 著

該書為探討澳門開埠迄今四百年歷史奧秘的重要著作，作者學養豐贍，目光獨到，以細膩的筆觸描述澳門歷史風貌，用透視人類精神歷史發展的開拓眼光評價澳門文化形成的特殊意義。

目 錄

前言	1
序(張汝霖)	11
後序(印光任)	15
澳門記略上卷	17
形勢篇(潮汐風候附)	19
官守篇(政令附)	59
澳門記略下卷	109
澳蕃篇(諸蕃附)	111
原書插圖	
海防屬總圖	202
前山寨圖	204
青洲山圖	206
縣丞衙署圖	208
正面澳門圖	210
側面澳門圖	212
關部行臺圖	214
稅館圖	216
議事亭圖	218
娘媽角圖	220
虎門圖	222
男蕃圖	224
女蕃圖	225

三巴寺僧圖	226
板樟廟僧圖	227
噶斯蘭廟僧圖	228
龍鬆廟僧圖	229
硬轎圖	230
軟轎圖	231
女轎圖	232
洋舶圖	233
附錄一 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間關於澳門的其 他記載	235
1. 屈大均《廣東新語·澳門》	237
2. 焦祈年《巡視澳門記》	239
3. 暴煜《香山縣志·濠鏡澳》(節錄)	240
4. 張甄陶《澳門圖說》	248
5. 張甄陶《論澳門形勢狀》	251
附錄二 有關《澳門記略》的序跋等資料	257
1. 俞正燮《澳門紀略跋》	259
2. 沈樸息《澳門記略跋》	260
3.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四《澳門記略》條	261
4. 孫馮翼《重雕〈澳門記略〉題辭依用二宋全韻》	261
附錄三 有關《澳門記略》作者印光任、張汝霖 的傳記資料	263
1. 《香山縣志》印光任、張汝霖傳	265
2. 袁枚《廣西太平府知府印公傳》	267
3. 姚鼐《廣州府澳門海防同知贈中憲大夫翰林 院侍讀張君墓志銘並序》	270
附錄四 本書注目索引	273

前 言

澳門是中外關係史上曾經佔據重要地位的一個城市，但是有關澳門歷史的文獻資料，在中文古籍裡保留得並不算多。這大概是由於澳門一地的興盛和發展，時在西方人人居之後，而中國人自己對它反覺陌生的緣故。然而澳門畢竟是中國土地的一部份，它的興衰去留是不會不被國人所關注的。早從明代起，中國若干官、私著作裡即有關於澳門的記述，例如明萬曆年間郭棐纂修的《廣東通志》裡收有《澳門》條，沈德符所著《萬曆野獲編》裡有《香山澳》一條，嘉靖、萬曆年間的朝臣龐尚鵬、郭尚賓等的有關奏疏也曾涉及澳門事務。到了清代，關於澳門一地的記載和專論在一些方志、政書、筆記裡更顯增多，並且出現了印光任、張汝霖合著的《澳門記略》一書。印、張二人的這部書，相當全面、系統地記述了澳門的自然地理狀況、歷史沿革以及明末清初時期當地的社會風情和中外交往情況，成為中國古代方志類圖書中專記澳門唯一的一種。在保留得不算多的中文澳門歷史文獻資料中，它的價值格外珍重。

《澳門記略》一書產生於清乾隆時代的前期，即公元十八世紀的中葉。這時上距葡萄牙人開始人居澳門的時間，約已過了二百年左右（據張汝霖在《澳門記略·序》裡稱：“自濠鏡開市以還，二百餘歲”。《澳門記略·官守篇》裡更具體講：明嘉靖“三十二年，蕃舶託言舟觸風濤，願借

濠鏡地暴諸水漬貢物，海道副使汪柏許之。初僅茭舍，商人牟奸利者漸運瓚甓榱桷為屋，佛郎機遂得混入，高棟飛甍，櫛比相望，久之遂專為所據。”這裡所講的濠鏡即澳門，佛郎機是明代對葡萄牙人的稱謂，嘉靖三十二年即公元 1553 年。）在這二百年左右的時間裡，葡人銳意經營澳門，將其作為它在遠東進行活動和國際轉口貿易的一個基地，繼之而來的其他西方國家也把澳門作為來華從事貿易、傳教等活動的落腳地和住冬場所，故此使這個“孤懸海表”的昔日漁村獲得十分迅速的發展，成為明清之際中國沿海最重要的中外貿易口岸和中西交往的中心地。雖然到了十七世紀中葉以後，由於荷蘭、英國等國先後取代了葡萄牙在東方的商業霸權地位，並開闢直抵廣州的貿易，澳門已經開始由盛轉衰（《澳門記略·澳蕃篇》裡講：“澳素饒富，國初洋禁嚴，諸蕃率借其名號以入市，酬之多金，財貨盈溢。今諸蕃俱得自市，又澳舶日少，富庶非昔比。”就是這種轉衰情況的寫照），但在西方國家從中國沿海奪得新的據點之前，它在中西關係中仍然起着相當重要的作用。這種情況一直保持到鴉片戰爭以前。

另一方面，在這二百年裡，明清兩代中國政府和一些地方官吏、封建士子也日益感到了居住、逗留在澳門的西方人所構成的威脅，越來越增加了對澳門的關注，並不斷謀求控制和抵禦之方。1574 年（萬曆二年）明政府在澳門半島與內陸連接的蓮花莖半建關閘，“官司啟閉”。1621 年（明天啟元年），又在距澳門十五里的前山寨建參將府，派遣陸兵七百、水兵一千二百餘名戍守。1685 年（康熙二十四年）開海禁後不久，清政府在澳門關前街設立海關。1731 年（雍正九年），移駐香山縣丞於前山寨，“分防澳

門”，“察理民夷”。1744年(乾隆九年)，又在前山寨設廣州府海防軍民同知(通稱澳門同知)，“專理澳夷事務，兼管督捕海防”，而將香山縣丞衙署進一步移入澳內望廈村(見《澳門記略·官守篇》)。同時，明清中國政府還一直向佔居澳門的葡人當局收取地租銀，並多次在澳頒佈律令，約束外人的活動，行使行政和司法主權。

葡人入居澳門後的二百年中，也是中西文化開始有所接觸的時代。中國人首先通過東南沿海地區(包括澳門)的對外貿易等交往活動，對西方人的體貌、服飾、器具、語言等有了一點感性的瞭解，而真正稱得上接觸西方的理性知識，則是以傳教士為媒介的。明清之際來華的耶穌會士利瑪竇、艾儒略、湯若望等，為了開拓傳教事業的需要，大量譯介西方書籍和知識於中國，其中不少屬於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包括世界地理學方面的知識。這些東漸而來的西學儘管在當時的中國社會裡未能產生大的影響，但畢竟使某些思想敏銳的知識分子增強了對中國之外事物的興趣和求知欲望。明末清初國內出現了一些域外地理學著作，如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張燮《東西洋考》、陳倫炯《海國聞見錄》、陳次雲《八紘譯史》等，都反映了這樣的趨勢。

《澳門記略》一書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應當說它的出現，既反映了澳門成為中西貿易和交往的中心這一歷史事實，也反映了中國官方和知識界對澳門的關注及加強海防、抵禦西方殖民者侵略的願望，同時它還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一些與西方事物有所接觸的中國知識分子中朦朧產生的瞭解西方、認識世界的要求。

《澳門記略》的作者是印光任、張汝霖二人。

印光任，字黻昌，號炳巖，清江南寶山（今上海市寶山縣）人。生卒年不詳。雍正年間由廩生舉孝廉方正，分發廣東為官。歷任石城、廣寧、高要、東莞等地知縣，所至頗有政聲，尤長於經辦中外交涉事，故 1744 年（乾隆九年）被選派為第一任澳門同知。印到任後，頗能忠於職守，首訂管理蕃舶及寄居澳門夷人規約七條，加強對澳門的管轄，並能妥善處理各項涉外事端。後來為他寫傳的袁枚曾稱贊說：“公任海疆久，于諸夷種類支派、某弱某強、某狡某愚、某地之山川形勢，靡不部居別白於胸中，以故先事預謀，當機立斷。終公之任，海面肅然。”（見本書附錄三：袁枚《廣西太平府知府印公傳》）印光任後來還曾擔任過廣東南澳同知和廣西慶遠、太平知府，因事去職。晚年在鄉家居，終年六十八歲。生平所著尚有《炳巖詩文集》、《翊軒編》、《補亭集話》、《雨吟碎琴草》、《鐵城唱和》等，今存者唯《澳門記略》。

張汝霖，字芸墅，清安徽宣城（今宣州市）人。生於 1709 年（康熙四十八年），卒於 1769 年（乾隆三十四年）。張於乾隆初年由拔貢生保舉知縣事，先後任職於廣東河源、香山、陽春等縣。1746 年（乾隆十一年）權澳門同知，兩年後實授。張在澳門同知任內，曾報請封禁澳門的“唐人廟”（向中國人傳習天主教的教堂），並“以他族之逼處也，蒿目憂之，時時見諸吟咏，著論四首，備言其病與所以藥之之方”（見本書附錄三：暴煜《香山縣志》張汝霖傳）。1748 年 5 月，澳門發生葡萄牙士兵亞嗎嘯、安哆呢殺斃中國民人李廷富、簡亞二案，葡駐澳兵頭若些不肯交兇，張汝霖反覆與之交涉，“心力幾瘁”。最後案件雖獲解決，並由張汝霖與香山知縣暴煜一起製訂了《澳夷善後事宜》十

二款，勒石刊佈，但張終因兇犯被葡方“擅遣”永戍地滿（即帝汶島，當時是葡萄牙殖民地），受到朝廷的申斥，降職去任。自此張汝霖遂返宣城家鄉，不復為官。張平生亦好詩文，除與印光任合著《澳門記略》外，還著有《辛辛草》、《吳越吟》、《耳鳴集》等，今多已散佚。

從印、張二人的簡歷中可以看出，他們都是具有一定對外禦侮思想的中下級官吏，同時也是同西方事物有過一段接觸、思想比較敏銳的知識份子。他們編著《澳門記略》一書，就是在這種禦侮思想和對西方事物的新鮮感驅使下進行的。印光任在《澳門記略·後序》中談及自己當年任澳門同知一職並着手準備寫作《澳門記略》一書的動機時曾寫道：“余不才，念事屬創始，爰歷海島、訪民蕃、搜卷帙，就所見聞記之，冀萬一補志乘之缺。”張汝霖在為《澳門記略》所作序言中也寫道：“自濠鏡開市以還，二百餘歲間，大事修戎，小事修刑，而余與印子值紅毛（按：指英國）、弗郎西（按：指法國）、呂宋（按：指西班牙）之轆轤，兵頭若些之復讐，念予手之拮據，尋已事之龜鑑，篇中尤三致意焉。”都反映了他們的這種創作意圖。

《澳門記略》全書共分上下兩卷三篇。上卷包括形勢、官守兩篇，其中形勢篇是記澳門的地理形勢、山海勝蹟及潮汐風候等，官守篇記澳門歷史沿革，主要是有關葡萄牙人人居澳門的經過和明清中國政府在澳門設官置守、實行管轄的情況。印、張二位作者都曾擔任澳門同知一職，故所記多取自衙署檔案、簿冊，或是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見聞，具有很大的真實性和史料價值。《澳門記略》下卷為澳蕃篇，專記居澳西人（主要是葡萄牙人）的情況，包括他們的體貌服飾、生活起居、習俗風尚、物產器具、船炮技藝、

語言文字等，同時對當時經澳門從事對華貿易的各西方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也有簡單的介紹。如前所述，澳門是明清之際中西貿易和交往的中心地，也是中國人當時得以窺見西方世界和文化的唯一窗口，故印、張所記不僅十分生動豐富地表現了早期澳門的社會生活，同時還真實地反映出明清之際中西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向當時仍處於封閉狀態下的國人介紹了若干西方事物和異質文化（儘管這種介紹仍限於十分膚淺的、帶有獵奇性質的表象觀察，存在不少的謬誤甚至偏見）。這些無論是對於當時的知識界，還是對於今天的研究者，都是很有意義的文字。《澳門記略》在上、下兩卷中，還分別附有若干插圖（計上卷十一幅、下卷十幅）。這些插圖用畫筆給人們留下了有關當時澳門自然狀況和社會風貌的若干形象的記錄，同樣具有史料價值。此外，印、張二人在詩詞方面也頗有造詣，《澳門記略》在正文相關處還注錄了他們與友人間吟咏酬唱的不少詩作。這些作品既是對正文形象化的注釋和引申，本身亦可供欣賞。凡此皆表明，《澳門記略》是研究早期澳門歷史和中西關係的重要史料，同時對於今天的一般讀者來說，它也是一部瞭解澳門歷史、地理概況和名勝古蹟的饒有興味的知識讀物。

當然，《澳門記略》寫作的時代正處於中國封建王朝加緊實行對外閉關政策時期（清初厲行海禁，到 1685 年雖宣佈開海禁，定廣東澳門、福建漳州、浙江寧波、江南雲臺山四處為對外貿易港口，但從 1757 年起又下令停開廣東以外的其它三口，並對限於廣東一地的中外貿易和交往規定了許多苛細禁令），《澳門記略》的作者儘管在對西方事物的接觸和瞭解程度上已屬當時的佼佼者，但他們

的眼界仍然十分狹窄，他們的思想還封閉在“華夏”與“蠻夷”的傳統模式之中。對於紛至沓來的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和西方文明，他們基本上仍處於懵懂無知的狀態。這種情況在《澳門記略》書中時有表現。例如，作為直接管轄澳門的清朝官員，印、張二人同自己的上司以及清朝中央政府一樣，居然會不知二百年來“僑居”澳門、當時仍同他們打交道的“澳蕃”始終是明代稱作“佛郎機”的葡萄牙人，而錯認作“西洋意大里亞”（即意大利人）。明季來華之傳教士利瑪竇在其所貢《萬國全圖》中介紹世界有五大洲，其中歐羅巴洲為國甚多，“意大里亞居其一”，印、張對此卻仍認為“其說荒渺無考”（見《澳門記略·澳蕃篇》）。至於書中將葡萄牙與西班牙兩國相混、法國與葡萄牙相混、英國與荷蘭相混等張冠李戴的情況，更是多有發生。這些舛誤雖多係沿襲《明史》等書的錯誤說法未加深考所致，但也足以表現當時國人世界知識之貧乏和進步之緩慢。

《澳門記略》的草稿本最初是由印光任於 1745 年（乾隆十年）在澳門同知任內寫成的。這個草稿本在印離任時交給了接署澳門同知的張汝霖，“期共成之”，後來又托交粵秀山長徐鴻泉加工潤色，不料卻因徐病故而遺失。到 1751 年（乾隆十六年）印光任擔任南澳同知、權潮州知府時，張汝霖恰巧也因公到潮，兩人聚首，提起舊事，決定重新編著《澳門記略》。於是“搜覓遺紙”，“大加增損”，終於再次寫成書稿。由於有這個曲折的過程，故印光任在《澳門記略·後序》中感嘆道：“此書僅兩帙耳，初非篇章繁雜必遲之歲月者，乃草自乾隆十年，粗得其稿，而失於徐子之手，歷五六年而殘楮剩墨棄置敝簏中，不為蠹魚所蝕，至今日而猶得腋集成編，此非張子不能成，更非同官鳳城

(按：即廣東潮州)亦不能成。無多卷帙，幾經聚散，不至終廢其成也，殆亦有數存其間耶？”當然在今天看來，這個冥冥中存在的“數”實際是並沒有的，但我們仍要感謝印、張二位作者的不懈努力，終於留下了《澳門記略》這部有價值的著作。

《澳門記略》書稿於 1751 年(乾隆十六年)最後完成後，不久即付梓印，是為該書初刊本。關於初刊的具體年代，目前一般認為即是乾隆十六年，如北京圖書館、廣東中山圖書館皆照此編目。但是乾隆十六年是印光任、張汝霖完成書稿並作序的年代，初刊本上並未標明付梓年月，故此說尚當存疑。

《澳門記略》的乾隆初刊本，目前在中國國內已甚罕見，僅少數幾個大圖書館有藏。該書流行較廣的刊本是清嘉慶五年(1800 年)江寧藩署重刊本(本書注文中簡稱為嘉慶本)和光緒六年(1880 年)江寧藩署再刊本(本書注文中簡稱為光緒本)，此外還有《昭代叢書》本、《如不及齋叢書》本、《筆記小說大觀》本等。這些流行刊本錯字均多，有的且有節刪，給閱讀帶來一定困難。為了向讀者提供一個較好的讀本，我曾以此書乾隆初刊本作為底本，校以嘉慶、光緒諸本，並參校《瀛涯勝覽》、《西洋朝貢典錄》、《明史》等，改正錯訛，標點分段，於 1988 年交由中國廣東教育出版社作為《嶺南叢書》之一種出版。但是校點只能解決刊本文字上的歧誤和句讀不便的問題，而無法起到幫助讀者理解古籍內容、考訂史實舛誤的作用，更不要說對書中所涉及的問題作學術上的探討了。而這後一方面的工作，卻恰是今天許多讀者和研究者所需要的。有感於此，我在 1988 年校點本的基礎上，此次復對《澳門記

略》一書的內容加以注釋，總計全書共注釋條目 1090 餘個。這些注釋條目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1)對重要史實的考訂，特別是原書記述有誤或與其他史料不盡吻合者；(2)地名今釋；(3)人物簡介；(4)對較特殊的物產、較費解的典章、習俗等的簡釋；(5)版本文字上的校勘。希望通過這些注釋，能够幫助廣大讀者更好地閱讀《澳門記略》一書和開展學術上的研究。另外，為便於查考起見，我還在書末編製了四個附錄，即：(1)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間關於澳門的其他記載；(2)有關《澳門記略》的序跋等資料；(3)有關《澳門記略》作者印光任、張汝霖的傳記資料；(4)本書注目索引（原書中重複出現的史實、地名、人名等，一般只出注一次，讀者如需查找，可利用這個索引找到出注頁碼）。

應當說明的是，我在從事本書校注工作中，曾參閱、利用了中外學者關於早期澳門史和明清中西交通史的一些著述，其中受益較多的幾部書是：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1988 年香港中文版）、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1982 年上海版）、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正》（1984 年北京版）、陳佳榮等《古代南海地名匯釋》（1986 年北京版）、黃文寬《澳門史鉤沉》（1987 年澳門版）、李鵬翥《澳門古今》（1986 年香港版）等。如果沒有這些前輩和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要完成本書校注工作是要比現在困難得多的，因此本書也可以說是在上述研究者工作基礎上完成的。當然，由於我的學識所限，這個校注稿仍很粗糙，舛誤之處在所難免，誠懇期望讀者不吝賜教，予以指正。

趙春晨

1990 年 8 月於汕頭大學歷史系

